联合国 S/PV.9448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八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四四八次会议

2023年10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弗朗索瓦·丹内塞先生	（巴西）
成员：	阿尔巴尼亚	哈萨尼先生
	中国	张军先生
	厄瓜多尔	佩雷斯·洛塞先生
	法国	德里维埃先生
	加蓬	比昂先生
	加纳	阿杰曼先生
	日本	石兼先生
	马耳他	弗雷泽夫人
	莫桑比克	阿丰索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士	贝里斯维尔夫人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卡阿比女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卡里乌基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伍德先生

议程项目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以对话谋和平：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安排对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

2023年10月3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2023/732）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601)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23-31475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以对话谋和平：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安排对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

2023年10月3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S/2023/732）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各位部长和其他高级代表莅临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他们今天与会凸显了所讨论主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请阿尔及利亚、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丹麦、埃及、埃塞俄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牙买加、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列支敦士登、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巴基斯坦、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塞拉利昂、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泰国、土耳其和乌克兰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下列人士参加本次会议：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以及和平行动部主管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助理秘书长哈立德·希阿里先生、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阁下、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阁下、以及和平协议矩阵项目主管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还邀请欧洲联盟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奥洛夫·斯科格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23/732，其中载有2023年10月3日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说明。

我现在请希阿里先生发言。

希阿里先生（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巴西主持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

预防性外交和对话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从未像今天这般重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不断升级的危险局势痛苦地提醒我们，迫切需要结束可怕的暴力，立即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并为通过谈判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政治解决开辟道路。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这种暴力的恶性循环有可能使整个区域在今后几年乃至几代人的时间里陷入冲突。

世界进入了新时代。后冷战时期已然结束，全球秩序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历史告诉我们，交替期的风险更高。这个新时代已呈现出的特点是，各国分歧日益加深，并且纷纷向内看。地缘政治局势达到几十年来最紧张的程度。各国之间的争论和竞争日益考验《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界限。随之而来的信任丧失——以及升级的风险——影响到几乎所有区域。

同时，许多国家对多边体系如何对它们有益持怀疑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已有一段时间。它们对不履行承诺和双重标准的做法深感不满。世界各地的妇女和男子也深深地感到，政府和国际组织未能为他们提供服务。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对国际准则的挑战日益加剧，谈判解决冲突的难度增加。可悲的是，寻求军事解决一直是最近冲突的一个突出特点，平民正在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曾帮助稳定大国对抗的全球和区域军备控制框架和危机管理议定书的处境恶化，增加了危险对峙、误判和升级的几率。在一些区域，全球政治的两极化表现在几十年来一直在促进区域稳定的一体化努力的瓦解上。

在此背景下，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政策简报概述了会员国采取行动，恢复接触、缓和局势、重新致

力于和平外交以及重建信任的办法。更有效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动力必须来自于外交。外交需要冒险、毅力和创造力。在想法相同的国家之间，外交接触很重要，而在意见相左的国家之间，外交接触则至关重要。外交首先要求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宪章》第六章规定，所有国家都应依靠和平手段作为解决争端的首选办法。它为在安全理事会框架内、在我们各自区域内或在双边层面解决我们的分歧提供了一系列方案。坚持《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原则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根据国际法，预防和解决武装冲突是我们的集体义务。区域组织和框架在这方面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可以为预防外交带来可信性和合法性。它们可以帮助增加信任和减少误解。它们可以加强危机管理机制。面对全球层面竞争愈演愈烈、威胁日益具有跨国性质，区域框架和组织可以为建立信任与缓和紧张提供途径。纵观近期历史，区域行动成功地防止了冲突和升级。

并非所有经验都可以从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传授，但其本质很重要。这种经验包括：如何开展对话以克服分歧，并在需要时寻求一个信得过的中间方协助，这个中间方有时来自区域内，有时来自区域外；如何确保沟通渠道保持畅通，甚至在争端升级为暴力时也是如此；以及如何顾及自己对手的担心和关切，并积极减少这些担心和关切，为此建立增进信任的框架。在长期安全架构正在崩溃或已陷入僵局的区域，或者从未存在过这种架构的区域，加强、建设或重建区域框架和组织尤为重要。我们还需要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正如《新和平纲领》所确认的那样，联合国会员国既有责任也有手段履行《联合国宪章》赋予它们的共同义务。会员国可以利用秘书长及其特使的斡旋，这不仅是预防和调解冲突的工具，也是将会员国聚集到一起寻求彼此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公正工具。斡旋可以帮助管控和扭转全球和区域关系恶化。

秘书处也有责任提出能够帮助增进信任和增加合作空间的建议。对挑战的共同认识是商定潜在解决办法的必要前提。这就是为什么《新和平纲领》着眼于对当下地缘政治问题进行统一的分析，将此作为共同解决问题的依据。我们有责任抓住每一个时机，就我们面临的威胁和挑战达成共识。秘书处的公正性至关重要。一个公正的秘书处能够帮助各国或冲突各方达成共识，即使在最复杂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并协助安理会决策，为此提供顾及在座各方不同看法的分析。在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我们需要至少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信任的机构。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寻找缓和局势与建立信任的途径。为此，我们需要拿出勇气来倾听他人的看法，并真诚地考虑这些看法。区域框架和机构在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搭桥作用。我赞扬它们以及所有那些每天为跨越分歧搭建桥梁而不懈努力的人。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竭尽全力维护我们的前辈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阿里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巴切莱特女士发言。

巴切莱特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巴西常驻代表团邀请我参加本次重要而及时的公开辩论会。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它必须针对更加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行调整。我们看到，冲突环境日益复杂，这使解决冲突更加困难，因为当地和区域态势与外部各方的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为了应对这些新的挑战，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强有力的、适用于各国的预防冲突与暴力的方针，这个方针要同贯穿于人权支柱和可持续发展支柱的行动指导方针相一致。预防工作能够拯救生命和捍卫发展成果。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描述了冲突各方为预防目的可以利用的工具：谈判、调查、调解、和解、仲裁、司法解决及其他和平措施和手段。预防危机主要是会员国的责任。我们必须重新平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方针，尽一切努力帮助各国避免爆发会给人类造成

巨大损失的危机。但是，我所提到的对话、调解及其他工具要想行之有效，就需要提前规划并及早实施，而且它们还需要具有持久性和实质性。为了真正建立互信，冲突各方需要遵守和执行其协议，如果它们真想预防冲突的话。即使冲突已经发生，这些工具在维持冲突双方之间或通过第三方的渠道或桥梁方面也会有所助益。

区域组织的作用及其与联合国合作开展的工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区域和次区域政府间安全机制具有根本现实意义。但它们需要取得成效。《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载有关于区域安排及其在维护和平方面的作用以及安全理事会在这些安排中的作用的规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的是，联合国必须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鼓励和促进其成员之间的对话，以实现加强区域组织、使之能够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一目标。

在7月份发表的关于《新和平纲领》的政策简报中，面对全球层面竞争愈演愈烈、威胁日益具有跨国性质，秘书长呼吁建立强有力的区域框架和组织。这些区域框架和组织应当促进建立信任、增加透明度以及缓和紧张。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治理不善、存在侵犯人权现象、人们对资源、财富和权力分配不均感到不满的地方，冲突会激增。

在我们纪念《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七十五周年之际，人权在所有区域都面临阻力。我们痛苦地看到，人权在全球范围内大幅萎缩，法治受到侵蚀，包括在武装冲突局势中。我们迫切需要回到核心原则上来。联合国是一个基于规范的组织。重建会员国之间的共识是这个国际体系的必要任务。外交应当是一种不仅能降低冲突风险，而且还能管控当今地缘政治秩序中不断加剧的裂痕并为共同利益开拓合作空间的工具。

妇女参与调解对于实现持久、积极的和平至关重要。这远远不止是平息枪炮声。妇女是经济复苏、社会凝聚和政治合法性方面的重要伙伴。妇女参与调解进程能帮助确保更加多样的社区成员参与建立和平。推动妇女切实参与所有决策、消除线上和线下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妇女行为以及维护妇女权利，不仅会有助于转移权力，而且还会促成在保持和平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我要强调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安排的积极经验，这些安排是我们建立信任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集体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我愿在发言末尾指出，1998年10月26日签署《巴西利亚总统法令》二十五周年正在临近。那是一个真正的历史性时刻，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国作为担保方的积极参与下结束了美洲的边界争端。这是区域行为体在建设可持续和平方面具有价值的明证。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巴切莱特女士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姆贝基先生发言。

姆贝基先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作为一个非洲人，我最由衷地感谢你将通过对话实现和平这个重要问题列入安全理事会议程，并邀请我参加安理会关于全球争取世界和平的各种因素的公开辩论会。

正如安理会所知，几十年来，绝大多数联合国维和人员部署在非洲，原因很明显，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我们大陆的冲突数量很多，曾威胁到或正在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也知道，几年前，非洲联盟（非盟）郑重决定要到2020年平息枪炮声。然而，现实状况后来迫使它将目标日期推迟到2030年。我说这番话是为了强调，非洲，特别是非洲联盟，显然继续需要与安全理事会直接合作，应对确保我们非洲大陆和平的挑战。

仅仅在三年前，即2020年9月联合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前联合国工作人员马克·科根就联合国与非洲在和平事务上的合作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写道，“联合国在非洲的维持和平工作从开头就是惨不忍睹的失败”。他接着列举了一些例子，包括1960-1961年联合国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干预；1994年灭绝种族期间对卢旺达的干预；1999年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二次干预，以制止当时已经造成300多万人死亡的内战；对南苏丹和马里的干预。显然，联合国和非

盟都不想让预防和解决非洲冲突方面的任何失败长期持续下去。在这方面，我谨提醒安理会成员注意和平行动高级别独立小组2015年报告（见S/2015/446）的一些要素，其中之一是该小组所说的“政治居首”。在这方面，报告写道，

> “持久和平不是凭借军事和技术介入而是通过政治解决办法得到实现和维持的。联合国在解决冲突、开展调解、监测停火、协助执行和平协定、管理暴力冲突和开展维持和平的更长期努力时，政治居首应是其做法的标志”（S/2015/446，第43段）。

第二个要素是该小组所说的“全球和区域和平与安全伙伴关系”，它写道，

> “小组完全赞同秘书长最近提出的‘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合作维和的时代’的说法（见S/2015/229）……带着新的信念，联合国和区域组织必须调动其比较优势，应对新出现的危机，同时维持对解决长期危机的支持。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全球-区域框架，通过负责任和有原则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制定一项果敢的新议程”（同上，第53段）。

我在小组报告中提到这两个要素，因为它们与加强全球和平努力所需的行动直接相关。就本大陆而言，不用说，我们的大陆组织，即拥有强大的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非洲联盟，具有比较优势，最有能力在其管辖的地区——非洲——确保政治居首，小组报告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坚持要求政治居首，即使在暴力冲突已经爆发的地方。它接下来明确写道，这一看法也适用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提到的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各种重要国际干预。我谨认为，对非洲联盟的这一看法同样适用于其他区域组织。这都强调了该小组的重要观点：需要一个大胆的新议程来建立一个强大的全球和区域框架，通过负责任和有原则的战略伙伴关系来应对这些挑战。

确保非洲联盟等区域伙伴强大到足以履行其作为全球和平架构一部分的责任，符合安全理事会的切身利益。在这方面，正如米歇尔·巴切莱特总统刚才所说，重要的是达成一项协议，利用一些联合国资源资助非盟领导的和平行动，这将有助于提高《宪章》第八章的实际重要性。我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削弱安全理事会。相反，安理会为了成功履行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庄严义务，需要强有力的区域伙伴，它们要能够在《宪章》第六、第七和第八章范畴内给予协助。我希望这次重要会议将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姆贝基先生所作通报。

我现在请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发言。

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巴西邀请我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作为圣母大学的代表，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这个充满危险和紧张气氛，且国际关系日趋被安全问题主导的时代，今天关于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的辩论迫在眉睫。当存在分歧和政治困难时，最需要持续的对话。这是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平安排的执行工作如何失败、在何时失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以及使我们集中关注如何设计和执行能够在短、中、长期取得成功的和平安排的最佳时机。在克罗克研究所的和平协定矩阵项目中，我们研究了1989年以来超过34项国内全面和平协定。在每项协议签署后，我们追踪了实施过程，最长可达10年。我们设计了一种专门监测承诺执行情况的方法，以便能够相互比较协定，并审视各项规定本身的执行情况。

该项目的数据提供了一些见解：哪些类型的规定或多或少有可能得到执行；执行过程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化；执行工作如何给协定推出后的各种结果造成影响。我们利用这种基于研究的知识，让冲突各方、调解人、谈判人员和民间社会组织参与对话，并就进程和内容问题提供技术咨询。我们数据库和分析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和平协定失败原因的见解。大多数协定失败的原因包括：它们所涵盖的问题不够全面；并非所有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都参与了谈判和执行；更重要的是，和平协定缺乏强有力

和独立的核查和监测机制。我来阐述一下其中的每一个因素。

第一，当和平协定中的承诺超出军事和安全规定的范畴时，例如涉及前作战人员复员和重返社会，协定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当它们纳入政治和社会发展、性别和族裔权利问题，纳入造福整个社会的司法改革时，也更有可能取得成功。这些改革往往是由战争受害者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代表带到谈判桌上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和平协议取得成功的第二个关键因素——坐在谈判桌前的行为体和利益攸关方必须包括那些受战争影响最严重的人，如妇女、青年和族裔群体。倾听受害者的心声有助于我们理解克服暴力所需的深刻变革，他们对协议的自主权则为执行进程带来更多支持。因此，将人的尊严置于建立和平的中心不仅是一个道德决定，也是冲突各方、调解人和谈判者的明智战略决定。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有助于和平协议取得成功并具有韧性的因素是拥有强有力、独立和可靠的监测与核查机制。和平协议矩阵项目的研究表明，与没有第三方机制的和平协议相比，有第三方机制的和平协议的执行成功率几乎高出百分之四十七。必须在和平协议的设计中纳入这些机制，并应根据其有效性、合法性和可靠性加以选择。这些机制对和平协议的价值凸显了学术机构和研究中心为独立监测提供技术知识和公信力的重要性。

请允许我重点谈谈时任总统胡安·曼努埃尔·桑托斯政府与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游击队于2016年签署的《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

在哈瓦那谈判期间提供技术支持后，签署方授权克罗克研究所加入国际核查机制，实时监测整个协议的执行情况。我们根据578项具体、可观察和可衡量的承诺创建了一个矩阵。超过35名哥伦比亚工作人员在首都和农村地区收集开源信息，并与《协议》各方、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和民间社会保持对话。我们对各项承诺的执行情况进行评级，从未曾启动到已经完成不等，并突出强调里程碑、挑战和改进机会。

哥伦比亚和平协议强有力、独立和可靠的核查机制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它对于保持势头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建设和平进程提供的支持和资源至关重要。我谨借此机会赞扬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特别代表兼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团长卡洛斯·鲁伊斯·马谢乌所做的工作。混合监测机制无疑是一种最佳做法，具有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推广的巨大潜力。

最近，菲律宾《邦萨摩洛全面协议》的签署方邀请克罗克研究所为执行工作提供监测和核查支持。我们的目标是与天主教救济会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一道，继续将和平协议矩阵项目的数据用作对话与和平建设的核心。

我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基于数据的证据和具体事例能够证明，当和平协议中包含的问题广泛涉及一系列政策领域时，当谈判兼收并蓄、让战争受害者参与时，当执行进程有独立的核查和监测机制相配合时，促成和平安排的持续对话就能取得成功。通过对话实现和平是有可能的，也是可以成功的。圣母大学对建设和平的承诺是一项长期任务。让我们永不停歇地努力在所有环境中建设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通报。

我现在以巴西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感谢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阁下、前总统塔博·姆贝基阁下、助理秘书长哈立德·希阿里和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介绍他们的看法和调解与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经验。我也欢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欧洲和外交事务部长伊利·哈萨尼先生阁下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外交部国务大臣诺拉·卡比女士阁下参加辩论会。

首先我要转达，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大使阁下对今天没有与会深表遗憾。他受邀代表巴西出席

明天的开罗首脑会议，并且正确地认为，局势的紧迫性和严重性要求他出席该会议。

巴西目前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正值国际政治发生重大动荡，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许多挑战。我们的第二个主席任期伊始，暴力事件再度爆发，这或许是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古老、最旷日持久的冲突局势。在一些新出现的冲突局势中，就像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绵延日久、再次夺走大量无辜生命的冲突中一样，安理会一直不起作用，不断丧失其公信力和合法性。但是，建立在《联合国宪章》基础上的集体安全体系仍然是我们的最佳选择。让我们努力改进它。

有几种改进方法，但有一种方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安理会必须投入更多精力，重振其作为预防冲突与和平解决冲突促进者的作用。我们应当更多地谈论和平以及如何实现和平。这是我们对在冲突中挣扎求存的四分之一人类的责任。

安理会今天可以做两件事来提高其有效性：它应该向内看，也应该向外看。向内看意味着重新审视其最初的任务授权，并重新发现其自身履行这一任务授权的一些工具。向外看意味着参考其他各级治理中的其他机制取得成功的举措。

第六章为安理会创造性地使用和平手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除了第三十三条所描述的一长串工具之外，第三十六条授权安理会“建议适当程序或调整方法”，而不限制这些程序或方法的内容。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安理会越来越注重强制措施，提供政治解决方案的创造性有所减弱。去年通过的决议中有一半以上明确提到了第七章，其他一些决议仍然纳入了最好放在第七章下的行动。

这种过度依赖第七章的做法产生了负面影响。它使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限制了安理会适应具体危机的能力，使与当地各方接触变得更加困难，这往往导致解决方案不够持久。然而，在其他地方，和平解决办法继续得到创造性和有效的利用。因此，安理会也必须向外看，研究预防性外交、调解和其他和平解决工具在哪些地方被证明是成功的，以及这可能给安理会自身的活动带来哪些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区找到大量和平解决冲突的例子。

有时通过机构实现了解决，有时是通过直接的双边或诸边行动。例如，在我们拉丁美洲地区，我们成功地就领土争端直接达成了双边解决办法，并就河流的使用问题达成了三边外交解决办法。秘鲁与厄瓜多尔25年前签署的《巴西利亚宣言》结束了长期领土争端，就是这种成就的绝佳范例。我们还成功制定了双边建立信任举措，建立了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机构等机构，以及里约集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组织等各类区域建立信任倡议。

它们是决心抛开对抗和争端、向前看的产物，同时解决我们真正的共同挑战，如贫困、不平等、社会和区域差距、经济瓶颈、可持续发展以及我们的社会面临的、蔑视我们主权的许多其他挑战。

尽管区域经验有许多不同的背景，但有一个共同点：加强信任、善用外交、真正的政治意愿和建立信任。信任和建立信心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冲突的任何成功进程的共同要素。当存在可信任的第三方时，它可以充当调解者，弥补冲突各方之间的信任缺失。当地区性机构被认为更可靠时，它们可以介入并发挥类似的作用。当一致选择诸如国际法院等值得信赖的国际机构提供帮助时，它可以有效地就争端作出裁决。

安全理事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使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规定的重振后的工具，更有力地支持这些区域和次区域进程。设立特别政治任务是根据第六章采取行动的一个例子，可以进一步探讨和改进。为了使这些工具更有效地实现保持和平的目标，它们需要与经常预算分开的适当资金，其机制应反映常任理事国的特殊责任，安理会授权的维持和平行动就是这种情况。它们还要求有切合实际、可实现的任务，这些任务要根据具体情况精心制定。它们不能被视为维持和平行动的低成本版本。最后，安理会与建设和平委员会之间的更密切协调将加强这些努力，从而有助于取

得更持久的成果。还有更多创造力的空间。安全理事会在设立附属机构来监测制裁制度方面卓有成效；然而，几乎没有任何附属机构专门协助和支持根据第六章开展的政治进程。今天就可以在安理会现有权力下设立这些机构。

安理会应该以健康的谦逊态度借鉴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区域经验。我们必须积极学习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在世界不同区域找到灵感，采纳那些补充联合国努力的举措。我们今天的通报者提供了许多例子。

我们需要扩大安全理事会，使之更能代表联合国会员国。谈判桌上有更多的声音可以帮助克服对抗逻辑，这种逻辑周期性地使这里的许多决策陷入瘫痪——不仅是在将近两年期间巴西再次从内部观察到的情况是如此，而且是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巴以冲突就是这样。在过去，即使在一些特定情况下存在激烈竞争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政治领导人和政府仍可以通过内外探索来寻找合作和建立信任的空间。他们制定不同类型的工具来预防或解决冲突。我们现在迫切需要领导人和政府拿出勇气和远见。在我们继续为我们想要的安理会而努力的同时，我们决不能忽视如何最好地与现在的安理会合作。这就是提议进行这场辩论的原因。我希望它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发人深省的想法。我感谢各位成员的参与，并感谢愿意分享其观点的众多发言者。

我恢复履行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我请阿尔巴尼亚外交部长发言。

哈萨尼先生（阿尔巴尼亚）（*以英语发言*）：我感谢主席国巴西组织今天的公开辩论会。我还感谢巴切莱特总统和姆贝基总统以及其他通报者对今天的审议提出宝贵意见。

举行这样一场辩论的时机再合适不过了。在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中，我们面临着一系列历史性的严重挑战，但我们对和平的集体承诺仍然坚定不移。乌克兰持续不断的冲突及其灾难性后果标志着欧洲安全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它继续对欧洲大陆以外的地区产生不利影响，并仍然强烈地提醒人们，迫切需要恢复对话与合作，以处理不满，解决争端。乌克兰人遭受的无法忍受的苦难和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为突出表明，当务之急是结束这场不公正的战争，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同样，在哈马斯发动卑鄙的恐怖袭击之后，中东局势最近急剧升级，给以色列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人类苦难，并对整个中东构成威胁。此外，世界各地的一些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冲突和大国对抗、恐怖主义、威权主义的回归、以武力违宪夺取权力以及公共领域的严重两极分化，所有这些都偏离了我们对和平与稳定世界的共同愿景，正在影响不同的社会，特别是少数群体以及妇女和儿童，他们往往受到的不成比例的影响。

面对复杂而相互关联的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通过和平与合作手段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这并不是灵丹妙药；它可能需要适应，以应对新出现的威胁，并需要始终真诚地认真参与。但它仍然是促进国际体系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工具。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呼吁联合国与区域框架之间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作为网络化多边主义的一部分。当前的地缘政治挑战使我们必须反思这种伙伴关系应如何发挥作用。

安理会与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最有效的合作形式是什么？这一点变得至关重要，特别是对小国来说，它们有时必须努力拼争才能使自己的声音得到倾听。区域组织为小国提供了一系列工具和平台，以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可见度和影响力。通过共同努力、倡导共同利益并利用其区域组织提供的资源和专门知识，小国可以对全球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在国际决策进程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作为欧洲联盟（欧盟）候选国，阿尔巴尼亚坚定地强调，欧洲联盟在一系列广泛问题上发挥着不可否认的作用，与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的工作完

全一致, 所涉领域包括和平与安全、满足世界人道主义和发展需要、促进和充分尊重人权、减缓气候变化、确保充分尊重国际法和加强对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等。

就在几天前, 我们在地拉那主办了第十次西巴尔干柏林进程首脑会议, 这是首次在欧盟以外在西巴尔干地区举行的首脑会议。这一举措启动了一个微妙但不可逆转的进程, 以实现和解, 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双边问题, 增进区域各社会之间的了解, 改善区域经济合作, 并为各国和整个区域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对所有各方都有利的双赢模式, 因为欧洲安全架构需要一个更强大、更巩固的欧洲。加速的欧盟扩大进程和柏林进程是将所有六个西巴尔干国家纳入欧洲联盟的补充机制。事实证明, 这是一项有效的投资, 有助于加强这些国家和广大欧洲共同体之间的联系, 促进区域的合作、和平与繁荣。

对手国家之间的权力博弈和利益竞争要么会加剧冲突, 要么能够促进冲突的解决。这从来都是如何选择的问题。多边对话与合作对于防止为了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而操纵争端至关重要。在处理和解决任何冲突时, 无论是旧冲突还是新冲突, 对话都至关重要。

实际上, 对话不仅是一种更好的方式, 对我们而言, 它是处理这些问题的唯一方式, 不管问题看起来多么棘手, 多么复杂。对话是我们在我们本地区作出的选择。它并非总是坦途。事实证明, 它可能很艰难, 令人沮丧, 但是无可否认, 这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共赢的办法。

今天, 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提醒我们, 必须在基本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致力于对话, 并认识到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尽管我们各国有不同的观点和利益。我们的责任是促使它们达成一致, 如果它们不能达成一致, 就利用我们为此目的建立的机制, 继续坚持不懈地想方设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

为此, 阿尔巴尼亚坚信,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作为任何一个国家集团的统一声音的传达者, 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确保强权政治不妨碍谋求和平。我要强调, 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潜力, 团结起来坚决维护为《联合国宪章》奠定基础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价值观, 我们就能安然处理当前全球挑战, 争取建立一个可以防止冲突、实现和平的世界, 同时确保人人享有一个更光明、更稳定的未来。

卡阿比女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今天的通报人——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巴切莱特总统、姆贝基总统和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所作的重要通报。

维持和平不是少数人的专属权限, 而是很多人的共同责任。安全理事会在预防冲突问题上常常用同一个声音说话, 而今天的会议为我们提供机会, 思考如何最好地利用这种共同责任。归根结底, 我们的预防工作产生的影响在于其结果, 而不在于我们的言辞。

在这方面,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今天愿谈三点意见。

第一, 联合国会员国的多样性为我们提供了切入点, 以便在他人失败后着手解决冲突。谋求和平太重要了, 不能不召集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无论是涉及安理会、各会员国还是区域组织, 重点不应当是谁来领导, 谁是追随者, 而是谁最有条件建立信任。

和平之路崎岖难行。如果广大行为体的最终目标一致, 就不应当把它们的努力视为相互对立。相反, 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工作应当相辅相成。例如, 安理会支持区域和双边层面的倡议和调解工作的结果, 可能大大有助于实现和平。正因如此, 安理会在愈演愈烈的加沙灾难性危机问题上用同一个声音说话才如此重要。区域努力对于立即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防止冲突向外蔓延的风险至关重要。他们的声音对于恢复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迫切需要的政治前景也至关重要。

第二, 必须建立信任, 并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在冲突看不到尽头之时, 建立信任措施可以建立至关重要的纽带。有时, 这意味着从小事做起。

消除冲突的努力或者军方之间既有的热线可以防止误判或者局势升级，并开始建立信任。诸如交换被拘留者之类的人道主义协定也有助于开放通信渠道，否则，这些渠道就会关闭。这并不意味着把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而是确保在人道主义优先事项上取得进展，例如保护平民，或者提供安全的人道主义准入。这些措施基于人道主义原则，或许有一天会促成更广泛的政治讨论。在多边机构作出百般努力或者劳而无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区域和次区域组织自下而上建立信任。

谈到和平努力，对当地动态、社会组织脉络和历史背景细致入微的了解，是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拥有的宝贵资源。可以利用这些资源产生更大的影响。

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强调当地和平倡议能够以何种方式促进这种自下而上的办法。关于宽容与和平与安全的第2686（2023）号决议鼓励联合国吸收当地社区、妇女、青年、民间社会和宗教领袖参与和平协议的调解工作。我们尤其欢迎越来越多地建立和支持妇女区域调解者网络，以及日益致力于确保妇女充分、平等和切实参与可持续的和平努力。

第三，协调是关键。采取多层级、多管齐下的办法，胜在可以加强预防冲突和调解的努力。但是，将来参与的调解者众多，有可能导致信息混杂，不利于取得进展。加强协调机制可能有助于避免挑挑拣拣的做法和很多混乱局面，特别是在以紧迫性为关键的情况下，以便在发生危机时，安理会和区域机构能够做好准备并取长补短，争取尽可能好的结果。例如，联合国支持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五方会议在与安全有关的事项上所作的工作就是良好事例，这充分说明，采取协调做法很有可能在实地取得成果。

目前中东出现严重危机，是因为有人相信可以无限期地管理冲突，而无须解决其根源。这不是解决之道，它突出表明，必须调动国际和区域行为体可以利用的一切工具，优先开展预防外交和解决冲突。

这些工具显而易见。关于预防性外交，最佳做法也显而易见。我们所需要的是使用这些最佳做法的政治意愿，即便是在失败的风险很高的时候。

弗雷泽夫人（马耳他）（*以英语发言*）：我也感谢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巴切莱特女士、姆贝基先生和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提出他们的想法和灼见来丰富今天的讨论。我首先感谢巴西组织今天关于这一重要议题的公开辩论会。

这是一个日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目前处在一个紧要关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做法使国家之间越来越失去信任。这样的行动或许在无法挽回地危害我们大家都依赖的多边体系。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还必须对付不断变化、攸关存亡的新威胁，例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以及网络犯罪。人权，尤其是妇女权利遭遇阻力，这在全世界都很明显。人权和包容性做法对民间社会至关重要，特别是有鉴于公民参与的空间日益缩小。如果不加以解决，所有这些情况都将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

冲突更有可能蔓延到区域内外，会使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和紧迫。它进一步凸显了多边主义和联合国在当今世界的现实意义，以及在预防方面增加投入的必要性。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广泛机制，可以为解决争端发挥关键作用。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所掌握的资源和工具。我们必须探索创新和创造性的方法，来充分发挥其潜力并更有效地加以利用。区域和次区域组织是多边体系的组成部分。它们对所在区域的深入了解是一种宝贵和不可或缺的财富，可以极大地帮助它们促进和平进程。欧洲联盟（欧盟）自成立以来，在确保欧洲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之上诞生的欧盟是多边主义和区域一体化如何带来和平、稳定、繁荣与增长的活生生例子。这条路是漫长而渐进的。然而，旨在建立信任、便利贸易和促进国家间

团结的政治意愿和持续努力已经产生具体和持久的成果。此外，联合国-欧盟对危机管理、调解与和平行动的现有综合办法，包括在各区域的支持，已帮助若干国家走过从冲突走向和平的艰难道路。

非洲联盟（非盟）的努力也是出色和值得称赞的。它积极促进非洲的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和平与安全不可分割的概念促成了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如非洲联盟驻索马里过渡时期特派团。非盟还就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儿童与武装冲突等关键问题采取行动。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值得投入力量。联合国-非盟-欧盟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三方合作就是一个例子。也必须确保在全球一级采取的行动，包括安全理事会商定的行动，得到区域一级行动的支持。

我们对和平解决争端的信念仍然未变，这体现在马耳他对外交和多边主义的承诺。乌克兰战争、非洲和中东的冲突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不稳定凸显我们继续面临的各项挑战。联合国——更具体地说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利用《宪章》所规定的一切手段和措施，优先考虑和平解决争端，推进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我们重申，加强联合国作为调解员和实施联合国所主导有效调解的能力是多么重要。《新和平纲领》大力强调预防和进一步加强调解能力。利用秘书长的斡旋对于促进和平解决争端仍然至关重要。为了在各级进一步落实这些努力，马耳他欢迎联合国特使和特别代表与其区域、次区域和国家对应方之间加强交流。我们也非常重视仲裁和司法解决。国际和区域法院和法庭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不可或缺。例如，安理会可以通过促进国际法院的管辖权以及确保遵守其裁决来更好地利用这一工具。

最后，我要强调我们的信念，即通过有效的多边主义进行合作仍然是推进我们集体努力的最佳方式。马耳他仍然坚定致力于建立一个有效的多边体系，以应对当代挑战并预防未来挑战。

比昂先生（加蓬）（*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倡议召开本次高级别辩论会，为我们提供一次机会，来审议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安排对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我感谢助理秘书长希阿里所作的通报，并感谢前总统巴切莱特和姆贝基在本次辩论会上所作具有启发性的发言。我也认真听取了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介绍。

围绕着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人类带来难以言表痛苦的最严重暴行、野蛮行为和霸权野心，联合国得以建立和巩固。正是为了让后代免遭战祸，世界各国人民承担起为和谐共处奠定基础的责任，并以围绕和平、发展与人权阐述的一套价值观为支撑。

即使在今天，和平与安全仍然受到下列各种因素的威胁：疫情、全球变暖的持续影响、恐怖主义，特别是萨赫勒地区恐怖主义的抬头、中东紧张局势、以及一些破坏国际关系并日益达到令人担忧程度的国内和国家间危机。我们正在目睹全球陷入不稳定状态的风险，这可能会带来混乱的后果。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中东危机在所造成风险规模以及所需承担责任范围方面构成挑战。这就是本次重要辩论会的意义和范围，它为我们提供一次机会，来重温我们的价值观和承诺，恢复信任，重振外交，并为预防与和平解决争端注入新的活力。

除了维护和平与使用武力，《联合国宪章》，特别是第六章和第八章还提供一系列工具。我们应当更深入地探讨如何予以利用，特别是考虑到：在由于反复出现危机而被削弱的区域，尤其是非洲和中东，紧张局势加剧，而且在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受到影响的欧洲一些地区也出现明显的骚乱。

对话是预防与和平解决冲突的特殊手段。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所指出的那样，在冲突以及违反国际法、国际人道法和人权的行动过程中有了根基的不信任和信任缺失，加上扩张主义的逻辑，显然导致各国对合作支持和平解决国际危机的承诺退缩，并降低多边解决办法的潜力。我们都知道，信任是建立可持续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关键。在这方面，重建信任纽带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有助于通过外交

加强努力和联合行动，有效防止并应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

加蓬继续高度重视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寻求和平方面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本区域建立了预防和管理危机和冲突的机制。其中包括总部设在我国的中部非洲预警机制以及中部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其任务包括预防使命的联合国区域办事处的工作也至关重要。总部设在利伯维尔的联合国中部非洲区域办事处开展的活动特别有价值，这些活动旨在缓解国家间的紧张局势，维持该区域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同样，罗安达进程和内罗毕进程在解决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危机方面的中心地位表明，次区域框架仍然是国际行动的可信渠道。同样，必须着重指出联合国中亚区域预防外交中心的主导作用，该中心提供一个平台，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等区域威胁、应对跨境水管理和气候变化提出协调一致的解决方案，并促进青年、和平与安全议程以及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

因此，这样看来，区域和次区域安排为建设和平伙伴关系设定标准，特别是因为它们考虑每个局势的具体情况，理解利益攸关方的真正需求，特别是妇女、青年和最弱势群体的需求，他们参与和平进程是一个关键因素。区域和次区域机制也提供一个理想的和平谈判与调解平台。

联合国与若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关系日趋密切，因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进行合作，在若干领域取得了众所周知的显著成就，包括在反恐领域，例如，在索马里部署由联合国提供支助的非洲特遣队；在大湖区建设和平，那里设有专门的联合国区域办事处；以及为解决苏丹危机而建立联合国—非洲联盟—政府间发展组织三方机制。

联合国与非洲联盟之间的合作是确保非洲和平与安全议程有效性的重要工具，因为该议程的有效性是基于两组织间伙伴关系的重要互补性和辅助性。因此，我要再次重点强调，亟须根据联合国摊款向非洲联盟和平行动提供可预测和充足的资金支持。

非洲愿意承担起保护和保障非洲大陆和平与繁荣的分内责任，热切期待安理会在资源上为此提供足够的支持，因为正是安理会负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最后，我要重申，我国重视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安排，必须加强这些重要工具，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服务。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召开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我也感谢助理秘书长希阿里、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所作富有见地的通报。我还要感谢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就和平协议的执行与核查作了重要研究。

我们赞赏巴西努力加强联合国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包括通过美洲国家组织（美洲组织）这样做。往往通过区域和平行动体现出来的这些伙伴关系至关重要，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不安全、冲突、暴力和恐怖主义所带来新的和新出现的全球和区域挑战。

就西半球而言，我们欢迎联合国与美洲组织、加勒比共同体（加共体）、各区域经济共同体、各区域机制等伙伴之间支持预防和调解冲突的合作，我们欢迎通过联合国建设和平努力进一步协作。就全球而言，我们注意到安理会最近于10月12日开会（见S/PV.9435）讨论非洲联盟—联合国合作努力，我们欢迎联合国与其他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包括欧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进行合作。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概述安全理事会在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广泛授权。这包括呼吁各方使用第三十三条所列手段，即谈判、调查、调停、和解、仲裁、司法解决、诉诸区域机构或安排，也包括如第三十六条所述，建议程序或调整方法。包含《新和平纲领》的未来峰会进程提供一个重要机会来评估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工具，包括第六章所述工具。在这方

面, 加强联合国调解支助股以开展更多国家和地方工作仍是优先事项。

在我们筹备明年的未来峰会时, 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在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在新出现和正在发生的危机中发挥重要的召集作用, 汇集民间社会、主要捐助方、地方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攸关方以确立明确的共同目标, 并协调各行为体的努力。我们欢迎《新和平纲领》将重点放在预防以及扩大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方面。我们要着重指出, 有必要将促进尊重人权以及推进国家法治和国际法充分纳入委员会工作范畴。不充分考虑这些问题, 就无法推进发展与和平。

安全理事会还必须对区域组织提出的支助请求作出回应, 以帮助解决它们正在努力解决的冲突。例如, 东盟在解决缅甸局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同时也呼吁联合国为其努力提供支助。为此, 安理会应寻求利用其可支配的一切工具支持东盟促进缅甸和平的努力。《新和平纲领》还建议——而且美国也支持——加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在这方面, 我们重申支持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的过渡进程, 并继续呼吁恢复由文职人员领导的民主治理。联合国和西非经共体的领导作用仍然至关重要, 有助于使过渡政府对其宣布的时间表负责以及促进区域稳定。

另外, 海地不断恶化的局势突出表明, 亟须针对日益严重的不安全状况采取强有力的灵活对策, 包括通过区域伙伴这样做。我们重申致力于与海地的伙伴, 包括地方领导人和民间社会、各区域机构和各国政府开展合作, 以支持民主机构。加共体一直是旨在恢复海地安全的努力中的重要伙伴。随着多国安全支助团开始其在海地的部署, 美国期待与之合作。

此外, 美国致力于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密切合作。我们赞赏并支持这些组织为了给其所有成员国带来和平、稳定与经济繁荣而开展的工作。

最后, 美国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与各区域组织——包括东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加共体、欧洲联盟、美洲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各次区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 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阿丰索先生(莫桑比克)(*以英语发言*): 莫桑比克热烈赞扬巴西召开此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们感谢通报人: 哈立德·希阿里先生、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阁下、前总统塔博·姆贝基阁下和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他们的通报重要且富有见地。

主席国巴西选择的主题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意义重大。对话是解决任何冲突的核心。对话弥合分歧, 促成互谅, 建立共同价值观, 并回归我们共同的人性。归根到底, 它是和平与和解之源。

我们认为, 通过对话谋和平与通过法律谋和平同样重要。事实上,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 只能从对话和对于攸关利害的价值观或者代表一个社会的价值观的共同理解中产生。没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 没有对话就没有信任。

通常来说, 在区域或国际一级看似突然的国家间冲突发生在显然缺乏对话,因而也缺乏信任的地方,。我们根据自己所在区域——南部非洲——的自身经验这样说, 南部非洲是过去因缺乏对话受害最深的区域之一。这个区域历经变迁, 摆脱了备受紧张、冲突和战争多重影响的过去, 变成了一个相对和平并坚决致力于对话、和解、合作和成功达成和平协议的地方。在南非, 当对话成为可能时, 殖民主义就结束了。当对话得到接受时, 种族隔离这种危害人类罪行就从地图上消失了。当谈判占据了舞台中央, 以结束源于殖民主义、掠夺和侵略遗毒的冲突时, 我们民众的生活也随之恢复了正常。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 有时结合使用第七章和第八章来实现的。

在此背景下, 今天的辩论会尤为重要, 因为它是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的时刻举行的, 尤其是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在这方面, 最至关重要的是在区域和次区域两级诉诸《宪章》第三十三条, 同时再加上双边

安排。它们是我们在非洲乃至全世界，通过全球联合努力处理冲突、建立信任、维护和平以及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在此过程中，我们认为，双边主义、区域主义和多边主义是相辅相成的重要机制。根据我们的经验，双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或者区域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并无互不相容之处。

我们认为，非洲联盟的和平与安全架构，连同它的《到2020年平息非洲枪炮声的实际步骤总路线图》（又称《卢萨卡路线图》），显然证明了这种相互关联性。用非洲办法解决非洲问题的设想本身就明确承认，地方、次区域和区域实体以及双边安排为实现可持续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无可否认的贡献。因此，我们衷心认同巴西的概念说明，该说明指出，“寻求和平是一项集体责任”。（S/2023/732，附件，第3页）

这是因为和平与安全是不可分割的全球利益。因此，它们包含全球责任，也因此要求在面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所受的威胁时分担责任和团结一心。我们认为，这不仅是《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也是整个《宪章》的文字和精神所承载的更大愿景和内容。

我们坚信，在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供资问题上，我们必须朝着同一个方向前进，正如塔博·姆贝基总统在今天的会议上非常明智和清楚地指出的那样，需要用我们在联合国的集体会费来分摊资金。因为这些行动有利于全球和平与安全事业，因此也有利于人类共同事业。我们希望强调，国际、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之间的有效伙伴关系以及双边安排在确保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占据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呼吁全体会员国重新作出并信守它们对联合国的根本宗旨和原则的承诺，并本着合作和志同道合的精神继续作出坚决努力。

石兼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巴切莱特前总统、姆贝基前总统和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通报。

世界动荡不安，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地缘政治挑战，包括乌克兰当前遭受的侵略，加沙地带周边局势的日益紧张，朝鲜多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非洲几个国家发生的政治动荡，这些只是其中几个例子。这些挑战严重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

为应对这些多样而复杂的危机，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并动用手中掌握的每一种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可资利用的措施——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和手段，包括谈判、调停、仲裁、司法解决以及诉诸区域安排——都很重要，应当充分加以利用。

边、区域和次区域安排是在拥有共同亲近关系和地理特征的各方之间基于互信和共同利益建立的，旨在通过对话解决区域问题。确实，我们赞赏这些安排为解决各区域的问题发挥重要作用。这可能包括非洲联盟和政府间发展组织就索马里问题、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就西部非洲、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就南部非洲、东南亚国家联盟、欧洲联盟就欧洲以及美洲国家组织就美洲作出的安排等等。我们应鼓励进一步利用此类重要机制，以应对当地以及其他地方的挑战。在这方面，必须强调建设和平委员会的作用，它是加强与包括区域组织在内的各种行为体的伙伴关系、交流各区域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的平台。

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各国之间对这些挑战尚不存在足够的信任，因此很少或者根本不举行对话，要么就是对话失败，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包括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义务，令人遗憾地屡屡得不到遵守。此外，由于当前各种危机常常相互关联，因此发生在一个区域的事件往往产生全球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同区域组织一道努力，应对共同挑战。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联合国和区域安排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辅相成。

联合国是多边主义最大和最后的堡垒，能够高举其旗帜发挥重要召集力。面对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峻挑战，我们绝不能排除在措施或安排方面可以作出的任何选择，无论是双边、区域、次区域还是多边措施或安排。我们应该敞开我们的选项，这样，我们就能在正确的时机和场所使用正确的工具。

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履行其职责。在联合国现有的诸多选项中，和平行动是它所掌握的一个必要手段。在安理会的统一支持下，它们的任务就有可能得到有效执行。如果得到妥当利用，区域组织的执行措施会发挥很好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联合国制裁如能得到明智和大力使用，也是一种合法、有效和重要的手段。

我们认识到，这些都是有益但却是事后的恢复措施。正如《新和平纲领》强调的那样，最重要的事情是防止危机于未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维护法治将加大可预测性，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并确保人权得到尊重。我们务须在这些基础上推进建设和平工作，以消除危机的根源。在我们看来，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人的安全等倡议的基本概念在这方面都是一致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的全球性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开展合作和协作。在这一集体努力中，每个国家和团体都很重要，任何安排——无论是双边、区域、次区域还是多边安排，只要本着团结的精神并依照《联合国宪章》行事，都能有所作为。我们应该努力克服彼此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创建一个关心人的尊严的世界，让弱势群体能够在其中安全无虞地生活。

日本充分致力于多边主义。我们一直并且将始终愿意积极为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要感谢哈立德·希阿里先生、智利前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先生以及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通报。我们感谢巴西倡议讨论区域安排对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的贡献这一极为重要议题。

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使会员国有机会避免使用武力，在相互谅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实现冲突的可持续和长期解决。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无可否认。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往往对当地现实以及文化、经济和社会特征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些组织可充当国家和国际倡议之间的桥梁，确保更有针对性和高效地解决冲突。

与此同时，会员国在这些架构内及其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关系中相互尊重和平等合作也很重要。在这方面，我们要提到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的积极例子；20多年来，该组织真诚地为区域稳定做出了贡献。我们正继续努力应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包括来自阿富汗领土的威胁和挑战。

我们打算继续为加强集安组织并提高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力和权威做出贡献。我们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和2010年《联合宣言》，进一步发展集安组织和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包括维和方面的合作。

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合作也是一个更广泛的优先事项。10月13日在比什凯克首脑会议上签署的独联体领导人关于多极世界中国际关系的声明再次重申了这一要务。我们也完全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对预防冲突的贡献。欧亚经济联盟的工作也为发展国际互利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

关于拉丁美洲区域，我们注意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和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的巨大潜力。拉加共同体汇集了美洲大陆的33个国家，旨在加强该区域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团结。它使利益和做法不同的国家得以找到共识和共同的办法。玻利瓦尔的团结、正义与合作原则激励着我们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该组织在尊重国家主权和每个国家独立的基础上，积极促进该区域各国人民的融合。

我们赞扬《特拉特洛尔科条约》50多年来有效正常运作。该条约是确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这一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地区拥有无核武器地位的第一份国际法律文书。我们随时准备与该区域各国就加强核不扩散制度进行富有成效的合作。

尽管我国在美洲国家组织内的观察员地位已经中止，但我们准备继续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一些继续表示有意这样做的伙伴开展专门合作。我们曾经在该

组织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通过美洲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和美洲药物滥用管制委员会开展了这种合作。

我们欢迎加强非洲联盟作为国际事务中一个主要大陆组织的权威，这体现于非洲作为多极世界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其全球性作用和影响与日俱增。我们赞扬非洲联盟开展富有成效的工作，打击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在内的恐怖组织构成的威胁。

我们倡导讨论如何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在安全理事会主持下的非洲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可预测性、可靠性、可持续性和灵活性，特别是通过联合国预算的摊款来提供经费。通过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和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其他区域组织加强区域稳定的潜力也很大。鉴于正在为解决巴以冲突所做的努力和缅甸的民族和解进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样做。

我们认为，欧洲联盟（欧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非常值得怀疑。我们不得不指出，近年来，该组织提出了主要是破坏性的倡议，其中满是零和游戏的逻辑，处处维护狭隘的一己私利。多年来，欧盟一直在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对抗做准备，对该国发生的各种现象视若无睹，这些现象若是发生在其自己的成员国中是不可思议的。欧盟践踏自己的价值观，正在向乌克兰提供进攻性武器和军事装备，违反自己关于向冲突区提供此类资源是不可接受之举的标准。欧盟没有为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做出建设性贡献，而只是扩大了这两个邻国之间的分歧。欧盟在贝尔格莱德-普里什蒂纳对话框架内主持谈判期间，从中立的调解方转而公开支持科索沃阿族人。结果，每一轮新的谈判都一次又一次地以失败告终，该地区的暴力又一次升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显然，布鲁塞尔完全出于地缘政治野心，意欲拓展新的势力范围，再次对政治和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国家进行殖民。因此，欧盟参与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努力只会导致暴力、混乱和无序。

北大西洋集团正在采取类似的新殖民主义做法，而它显然是冷战的残余。北约的行动致使大量平民伤亡，摧毁基础设施，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在法律或事实上导致有关国家崩溃。多年来，该联盟的活动一直着眼于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北约现有的理论文件明确阐述了这一目标。就像欧盟一样，今天的北约特别关注乌克兰，乌克兰已成为对抗俄罗斯的主要跳板。此外，最近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该联盟希望将其活动扩展到亚太地区，以遏制另一个被华盛顿和布鲁塞尔视为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国。

在西方推行对抗的背景下，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的处境严重恶化，该阻止原本拥有一套预防冲突与和平解决争端的独特工具。今天，这个主要由欧洲联盟和北约成员组成的组织不幸迷失了方向。去年的欧安组织主席国波兰和今年的主席国北马其顿公然藐视欧安组织协商一致的基本规则和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极力推动西方的议程。它们一直在强行将整个议程乌克兰化。结果，该组织现在陷入瘫痪，有可能完全失去它作为欧洲空间支柱所起的作用。解决这一危机将需要认真地开展工作，回归建立该架构的初心。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方准备这样做。

区域组织原则上可以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它们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根据安全不可分割、相互尊重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按照联合国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国际法准则，努力通过政治和外交办法，解决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准备与所有有意在这一积极的协调制度内开展工作的区域组织和国际社会成员进行建设性合作。

张军先生（中国）：中方赞赏巴西倡议召开此次区域机制作用问题公开辩论会。我感谢基亚里助理秘书长所作通报，认真听取了巴切莱特女士、姆贝基先生和民间社会代表的发言。

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首要责任。同时，联合国宪章第八章鼓励通过区域安排和平解决争端。多年来，各种区域安排都在积极发挥作用，推动解决冲突争端，维护国际和平稳定，同联合

国作用相互补充。当前国际地区形势动荡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区域机制如何与联合国协同发力、维护共同安全，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我愿强调以下四点：

第一，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区域机制要始终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当事国人民意愿和选择。采取强制行动时严格遵守安理会授权。应秉持开放包容，不搞阵营对抗。

第二，要加强沟通协调。国际和区域机制在建立信任、斡旋调解、维护和平方面应当相互借鉴和促进。区域机制可发挥优势，以地区方式解决地区问题。联合国要加强统筹协调，合理调配资源，提升各机制能力。

第三，要注重预防外交。区域机制应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斡旋、调解等手段和平解决争端，避免危机升级或扩大。

第四，要注重消除冲突根源。区域机制要统筹推进维护和平、建设和平、战后重建三阶段工作，特别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加强能力建设，改善民生。要帮助冲突后国家融入区域合作，实现持久和平。

巴以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说明零敲碎打的危机管控不可持续，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案刻不容缓。中方支持阿盟和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发挥引领作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应当倾听阿拉伯国家呼声，同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区域机制加强协调，以联合国有关决议、“阿拉伯和平倡议”等国际共识为基础，拿出有力举措，推动尽快停火止战，全力保障平民安全，防止更严重人道灾难。

中方支持联合国同非盟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总结推动解决非洲热点问题的有益经验，更好促进非洲和平发展。联合国要帮助非洲提高自主维和、维稳和反恐能力，提供必要资源支持。

阿富汗处在和平重建的关键时期，地区国家特别是周边邻国为阿富汗局势平稳过渡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联合国应同“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组”、阿富汗邻国机制加强协调、形成合力，帮助阿富汗实现持久安全和发展繁荣。

东盟成立以来，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着力打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联合国作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应支持东盟主导和用“东盟方式”解决缅甸等地区问题，为东盟凝聚共识、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加共体为推进海地各党各派包容性对话搭建平台，为支持海地寻找“海地人所有、海地人主导”的政治解决方案作出积极努力。我们支持联合国与加共体加强互动，共同推动解决海地危机。

欧盟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我们希望欧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主权平等原则，平等重视各国合理的安全关切，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欧盟应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结合发展中国家需要，有针对性地向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我们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时代呼唤团结合作，团结合作是应对各种全球挑战的基本前提。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在北京成功举行，取得丰硕成果。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形成3000多个合作项目，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带动4000万人摆脱贫困，极大促进了各国互联互通和共同发展。我们将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继续同世界各国和地区机制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共同安全作出新的贡献。

贝里斯维尔夫人（瑞士）（*以法语发言*）：战争和暴力经常突然爆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各方人员伤亡，而且往往是平民伤亡。自哈马斯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和进行袭击以来，中东发生的悲惨事件提醒了

我们这一点，令人痛心。战争常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爆发，但我们该如何建设和平？本次辩论会为我们提供机会来讨论这一问题，我感谢巴西为此目的将我们聚集在一起。我和各位同事一道感谢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巴切莱特和姆贝基两位前总统以及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所作的通报。

最近，哥伦比亚和平建设者Genith Quitiaquez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讲话。她说：

（用西班牙语发言）。

> “和平就是共同筑建一条河。这可能貌似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石头，也需要很多稳固物，而我们妇女将是泡沫材料，永远在寻求实现和平，采取变革性行动。”

（用法语发言）。

这些话提醒我们，和平是一项集体努力。早在1945年，《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就将这一信念牢固地载入了《宪章》。任何共同建设努力，当然包括建设和平的努力，都需要信任，这是我们5月份公开辩论的主题（见S/PV.9315）。这也是瑞士在所有调解经历中，特别是在哥伦比亚的调解进程中提出的意见，20多年来，我们一直支持哥伦比亚这一进程。

当然，信任不是天生的。它必须是建立起来的，是需要赢得的。信任往往在鼓励继续对话和技术合作的区域组织中找到肥沃的土壤。因此，多年来，数百次的坦率交流，信守承诺，真诚的姿态，都相得益彰，为雄心勃勃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即使在混乱的情况下，区域组织往往也能坚持到底，这并不令人惊讶。瑞士是历史最悠久的地区性组织——欧洲主要河流之一——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我从小在莱茵河畔的城市巴塞尔长大，看到这条河成为跨境合作和信任的源泉，一直印象深刻。

因此，区域组织在牵头调解冲突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在日内瓦就格鲁吉亚问题进行的国际讨论就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和联合国正在主持处理与受冲突影响人口有关的关键和实际问题。鉴于战后十五年有些挑战仍未得到解决，这种合作对于维护格鲁吉亚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那么，当区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时，安全理事会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安理会可以发挥三重作用：作为规范守护者的作用、促进作用和预防作用。我来作一解释。

首先，安全理事会必须确保区域安排符合人权等普遍准则。正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福尔克尔·蒂尔克5月3日在本会议厅强调的那样（见S/PV.9315），维护准则能够促进信任。这就是安理会作为准则守护者的作用。

第二，安理会可以加强调解冲突的区域努力。这方面的一个重要工具是分享观点和建议。安理会的实地访问和非正式互动对话为这种交流提供了机会，使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在促进和平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这就是安理会作为催化剂的作用。此外，建设和平委员会采用这些做法，才能发挥团结作用。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安理会应发挥其预防作用，把重点放在总体合作上。一方面，这涉及到联合国特别政治任务的作用。我们必须确保这些任务更多地参与预防，包括加强区域努力。另一方面，秘书长应该如他在《和平新纲领》中所承诺的那样，充分利用其所有调解工具。

正如助理秘书长早些时候所说，《新和平纲领》可以作为我们所有人——安全理事会、联合国以及区域、次区域和地方行为体——的共同参照点。有人说，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这也适用于地方、区域和全球各级的和平载体，但前提是这些载体需指向同一方向并汇聚于同一目标，犹如小溪汇成江河。现在，我要再次提到我早先提到的莱茵河中央委员会。它仍然生动地证明了合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实现共同的目标，即使我们有时逆水行舟，有时却乘风破浪。最重要的是，所有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循我们共同的信念，即避免每一场冲突都有利于全人类，进而和平解决争端。

卡里乌基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还要感谢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巴切莱特和姆贝基两位前总统以及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所作的通报。

秘书长在其《和平新纲领》中的分析意见应该引起我们所有人的共鸣。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经历着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冲突，经历着生死存亡。根据奥斯陆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去年发生了55起冲突，与战斗有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984年以来的任何一年。十多年来，冲突一直无情地走向错误的方向。为什么我们有时显得完全无力扭转这一趋势？安全理事会、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和其他行为体如何才能改变这一趋势？

我要提出三点想法。

第一，我们可以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方式，做更多的工作，支持国家行为体预防和解决冲突。事实上，这应该是我们的第一站。它已经载入《联合国宪章》，《宪章》首先要求冲突方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和平绝非易事，只有国家真正、而且以包容各方的方式掌握主导权，才能维持持久和平。这通常需要作出艰难的决定，而且需要真诚的朋友给予帮助。在几个和平进程中，联合王国有幸成为这样的朋友。我们继续通过双边和多边伙伴，包括作为联合国全球和平方案的主要自愿捐助者，积极支持解决冲突的努力。

第二，我们可以支持、帮助加强区域组织，与它们更好地进行协调。安理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进行年度对话，是一个已经取得成果的模式。但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这一模式，包括加强预警机制之间的联系、更好地利用更广泛的联合国和区域建设和平架构以及更加协调一致地支持国家主导的预防战略。我们与加勒比共同体在海地问题上的接触，以及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在缅甸问题上的接触，都是区域机构发挥重要作用并成为安理会伙伴的另一些例子。联合王国一直是《宪章》第六章的坚定倡导者。在地缘政治分歧严重的时候，更加需要区域组织发挥积极作用。

第三，在国家和区域努力失败的情况下，安理会有责任采取行动捍卫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最后手段，我们可以通过调动所有可支配工具进行有效预防、调解和建设和平，以避免冲突升级，从而更好地避免采用该最后手段。

佩雷斯·洛塞先生（厄瓜多尔）（*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先生、前总统巴切莱特和姆贝基以及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通报。

1992年，当厄瓜多尔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时，我们仍处于与秘鲁的领土争端中。这是南美洲最古老的边界争端之一，使两个兄弟民族疏远多年。10月26日，我们将庆祝我国和秘鲁的1998年《巴西利亚宣言》签署25周年。

厄瓜多尔历来促进和平及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些原则是我们外交政策的基础，也是我们担任安理会成员期间的优先事项。因此，我要感谢巴西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并感谢通报人的发言。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载的和平解决争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一。国际社会对这一原则的重视可见于各项后续文书中对此原则的重申，如1970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1982年《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和大会1992年关于和平纲领的第47/120B号决议。《宪章》第六章关于和平解决争端的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各国可以用来实现和平解决的手段。然而，正如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所指出，在实现和平解决方面，这些手段利用不足是国际社会的最大缺陷之一。

我国认为，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协定能够补充和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努力。最先识别新现冲突迹象的是区域行为体。它们还可以通过建立非军事区和停火以及支持政治和谈判进程等手段来保证和平协定的执行。拉丁美洲在这方面的经验

颇具启发性。在我们区域历史上，武装冲突和内战频仍，但近几十年来，我们区域却显示了预防与和平解决冲突的能力以及成为无核武器区的政治意愿。厄瓜多尔认可区域机制对于和平解决争端的价值。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厄瓜多尔和秘鲁在1995年初爆发塞内帕武装冲突后于1998年签署了《巴西利亚宣言》。同年2月，两国商定了《伊塔马拉蒂和平协议》，为谈判进程铺平道路，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美国以保证国的身份为这一进程提供支持。厄瓜多尔—秘鲁军事观察团是根据《伊塔马拉蒂协议》并在保证国的充分承诺下成立的。这使得建立非军事区成为可能，而非军事区又成为和平进程的关键基础。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双方举行了几轮谈判，首先是在巴西利亚，然后是在各保证国首都。一个谈判代表团和四个委员会先后成立，以处理贸易和航行、边境融合、共同陆地边界的地面界标、旨在建立相互信任和安全的措施以及萨鲁米亚运河的使用等问题。1998年10月26日，随着《巴西利亚总统法令》的签署，我们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和平，并确认两国政府达成的谅解对于厄瓜多尔和秘鲁兄弟人民的发展和福祉具有历史重要性。我们通过外交和国际行为体的调解和平解决冲突，证明了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可以解决的。此外，这还在本区域建立了一个重要先例，其中包括我提到的《巴西利亚宣言》。

最后，我要回顾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2017年在安理会的首次发言（见S/PV.7857）中呼吁开展和平外交，重点强调了区域组织的重要性。厄瓜多尔有同样的愿景，并呼吁安理会采取行动，以履行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记住，与第六、第七、第八和第十二章有关的事项也属于安理会的职权范围，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安理会的决策权对所有会员国都有约束力。厄瓜多尔认为，这项义务也适用于《宪章》第二十七条第三项，其中规定：“争端当事国不得投票。”这是一项法律义务，不仅必须履行，而且必须真诚履行。

德里维埃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两位前总统、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和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通报。

我想强调三点。法国作为欧洲联盟成员，坚信区域一体化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逻辑从一开始就是欧洲联盟的核心。欧洲建设始于1951年，当时建立了煤炭和钢铁共同市场，煤炭和钢铁行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战略行业。这一愿景仍然是当今欧洲建设的驱动力。苏联解体后，欧洲联盟的扩大是对数百万欧洲人的民主愿望作出的响应。这也是一个稳定因素。这是自从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通过在乌克兰得到认可的欧洲视角继续倡导的模式。该模式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即主权、人民自决权以及和平解决争端。我们支持所有认同这一愿景的区域行为体。

在非洲，非洲联盟和次区域组织发挥决定性作用，包括最近在面对政变蔓延的情况下。欧洲联盟显然是非洲联盟最大的捐助方，并将继续与它同舟共济。2022年至2024年，通过欧洲和平融资机制向非洲联盟提供的支助达到6亿欧元。姆贝基总统今天参加会议，让我们想起他在过去15年里为苏丹和南苏丹实现和平所做的工作。我们重申，在苏丹冲突绵延6个月并继续肆虐之时，我们支持非洲联盟和该区域所有利益攸关方所作的努力。

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与欧洲联盟7月份举行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显示了这两个组织之间关系密切。这一伙伴关系对于应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外的共同挑战、尤其是抗击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在亚洲，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合作也是法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在联合应对多边挑战并加强区域稳定。这也是欧洲联盟与东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精髓。

最后，我们绝不能忽视一个事实：互补性是取得成效的条件。区域层面的行动必须继续补充安全理事会的行动。这是《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的精神。安全理事会仍然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当区域大国越来越多地企图利用其影响力强行造成既成事实并阻挠区域调解努力时，这一点至关重要。互补

原则也适用于秘书长提出的《新和平纲领》。该倡议从根本上重申，联合国需要其会员国采取集体行动，以有效履行其职责，无论是涉及秘书长的斡旋、捍卫人权，还是维持和平。法国为制订该项战略做出了贡献，并呼吁全体会员国利用该战略。我们尤其支持秘书长呼吁为非洲和平行动提供可持续的资金，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的分摊会费。

阿杰曼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加纳感谢巴西在担任主席期间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强调对话与和平手段对于预防和解决争端的重要性。我们感谢助理秘书长哈立德·希阿里的通报，以及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和塔博·姆贝基先生的发言，他们的发言强调，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必须更多地诉诸于和平解决的工具。我们同样注意到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的观点，尤其是提醒我们，学术界可在强调对话对于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方面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主席先生，正如你关于本次会议的概念说明（S/2023/732，附件）所指出的那样，和平的工具在预防和解决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冲突方面裨益良多。然而，看起来颇为讽刺的是，我们往往没有把诉诸和平工具作为第一选择，尽管在国内机制、区域议定书和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条约中不乏此类规定，同时还预见到国家内部、两国之间和多国之间的交往有可能造成争端，但是，。因此，我们认为，包括对安全理事会而言，难点在于我们当前如何能够转变我们的集体意愿，放弃需要使用武力的措施，转而采取和平手段。说到这里，我们注意到有些人认为，诉诸和平手段未必会产生他们所希望的结果，或者他们寻求以这种手段取得的结果并不一定会迅速产生，或者毫不拖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特别是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和平手段通常是公正的，并且已经产生了持久的结果。

因此，我们鼓励所有会员国，特别是安理会成员，在处理我们目前面临的诸多争端时，更深入地利用《联合国宪章》第六章的规定。作为安理会并且就全体会员国而言，我们应当抓住秘书长关于《新和平纲领》的政策简报提供的机会，重新思考我们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办法，更多地采用和平方法，这些方法经过了时间考验，事实证明可以持续维持和平。

主席先生，针对你的概念说明提出的引导性问题，我们认为，更好地运用本组织《宪章》第六章的最佳办法莫过于此——更充分地利用这一章。作为会员国，我们必须重新承诺利用各种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而作为安理会，我们应当为履行我们的职责发挥更有力的作用，呼吁争端当事方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提供强有力的促进支持加以跟进。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加强秘书长在联合国内部的专职能力，为争端国提供支助，帮助它们提高对本组织和平支助架构的信心。在这方面，我们赞扬秘书长的斡旋和联合国的调解工作，包括调解问题高级别咨询委员会以及资深调解顾问待命小组的工作，它们对于预防外交议程仍然至关重要。我们敦促把这些调解能力与区域安排的调解能力结合起来，从而利用区域知识和经验以及联合国的全球资源，增强和平工具的影响力。

包括非洲区域安排在内的很多区域安排的经验展示出许多有用的预防和解决冲突机制，例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非洲联盟预警系统、非洲联盟智者小组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长老小组，以及为化解紧张局势、促使作出和平解决的承诺以及解决争端而设立的其他特设机制。虽然这些预防机制大多数仍然大体有效，但仍然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弥合意图与影响之间的差距，以减少引起关注的争端失去控制并演变成暴力争端的情况。因此，提供更多资源来支持这些机制的有效运作，可提供帮助，使它们能够如《宪章》第八章所设想的那样，代表国际体系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

为了改善安全理事会与区域、次区域和双边安排的合作，除了安理会有侧重点的实地访问以外，我们鼓励与那些正在为和平解决争端作出杰出贡献的安排定期举行非正式互动对话。举行这类对话的目的应当是探讨如何在跨区域的背景下调整和复制这些安排的独特优势和成功经验，以支持解决安理会议程上

的其它争端。哥伦比亚和平进程和喀麦隆-尼日利亚混合委员会的经验就是值得借鉴的例子。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们欢迎秘书长在其《新和平纲领》中强调预防外交，同时，我们着重强调调集支持以解决治理和发展不足的重要性，这些不足是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国内危机的根源。投资于人民，包括妇女和青年，可以增强其应对复杂挑战的韧性，有助于建设和保持和平，打破不稳定的循环，并且扭转脆弱性的诱因。同样重要的是，我们需要鼓励不同国家接纳其社会全体，包括它们的族群和宗教领袖，事实证明，他们的当地智慧常常有益于解决许多冲突。

最后，在目前情况下强调预防以及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间必须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是恰当的做法。它以对国际法的坚定承诺为基础，应该加强我们的集体决心，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当代的无数危机。对于我们这些来自非洲大陆的人来说，这种办法也是到2030年平息枪炮声，实现非洲大陆和平与繁荣的最可靠途径之一。一些安理会成员今天上午讨论了当前世界各地新出现的各种挑战，纵观这些挑战，可以肯定的是，时不我待，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加快利用和平解决办法来预防和解决争端。

主席（*以英语发言*）：鉴于发言名单上还有很多发言者，我谨提醒所有发言者将发言时间限制在四分钟内，以便安理会能够迅速开展工作。四分钟后，麦克风颈圈上的灯光将闪烁，提示发言者结束发言。

我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Peñalver Portal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欢迎你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与会，并欣见为本次公开辩论会选定的议题具有现实意义，鉴于国际舞台上威胁多边主义与和平的行动危险升级，这个议题现在显得更加重要。

必须立即停止最近的这种行动，即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众进行狂轰滥炸，摧毁房屋、医院和民用基础设施，并剥夺巴勒斯坦民众的水、电和燃料。

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种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动开脱。当务之急是确保立即停火并让平民获得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防止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理应属于他们的土地。

如果我们放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例如占领国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犯下的这些罪行，就不可能有和平。美国参与犯下这些战争罪行是可耻的，在通往和平的道路上开创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我们重申古巴革命的历史性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的坚定愿望，即实现和平，让世界各国人民享有尊重、权利、独立和安全。保障和平共处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途径是确保多边主义和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的原则和准则。

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促进通过谈判和对话和平解决冲突，以确保各国的安全和主权，以及区域和国际和平、稳定与安全。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威胁性言论、单方面制裁和胁迫性措施的实施、干涉主义政策和双重标准。在媒体精心策划的谎言基础上篡改事实，将政府妖魔化以挑起政权更迭，以及在所谓的“第四代战争”中使用混合技术破坏政治稳定，已成为一些国家令人不可接受的做法。

企图在多边舞台上强制推行一元化思维不利于和平。当人们谈论建立一个有章可循的世界时，这种做法试图取代国际法所承认的准则以及《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和原则——我们不赞同这种有选择性和有偏见的做法。只有将多边主义作为解决冲突的唯一可能途径，并在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情况下解决我们的分歧，才能在正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

第二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共同体首脑会议在哈瓦那通过《宣布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为和平区宣言》近十年后，该文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有效性。该文件赞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在其国际关系和彼此关系中永远杜绝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

这就是结束拉丁美洲最后一场武装冲突的区域努力的背景，这场冲突在哥伦比亚持续了半个世纪。古巴感到自豪的是，我国作为和平谈判的保证国和东道国，为达成政治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做出了贡献，这证明我国致力于促进本区域和世界的和平。

任何国际和平努力都必须从会员国承诺遵守经多边谈判达成的政府间文书和协议以及遵守联合国相关机构的任务授权开始。秘书长《新和平纲领》中概述的对和平与安全支柱采取预防性办法的想法，要求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人民自决权不可剥夺、政治独立和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以确保这些办法不被用作为推进地缘政治议程和利益开脱的借口。

《新和平纲领》也要求对安全理事会进行全面和深刻的改革；增加南方国家的代表性；提高其工作和程序的民主性、透明度和包容性；停止干涉大会和其他机构的任务和职能，以维护本组织的有效性和公信力。

当今世界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在公正和公平的国际秩序基础上以新的文明方式实现共存，让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对话与融合得到彰显。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奥地利代表发言。

马席克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

我们离明年的未来峰会越来越近，我们欢迎有此机会与安理会成员讨论《新和平纲领》。今天的辩论会也涉及奥地利的两个关键优先事项——预防冲突和建立强有力的伙伴关系。

首先，我要谈谈预防问题。在日益严峻的和平环境中，只有我们投资于预防和建设可持续和平，联合国的工作才能取得成效。我们深信，可以在《新和平纲领》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独特机会，把注意力转移到预防性外交、调解和建设和平上来，在社会内部建设抵御能力，并消除冲突的根本驱动因素。

我们坚信，预防关系到我们所有人，而不仅仅是某些脆弱国家。正如人权具有普遍性一样，所有国家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建设包容、公正以及——最重要的是——和平的社会。因此，我们赞同秘书长关于《新和平纲领》的政策简报中所载的呼吁，即转变做法，使所有国家都同意将预防和保持和平作为所有国家都致力于实现的目标。

在未来峰会的筹备阶段，至关重要的是讨论我们如何才能落实这一呼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结构，如可持续发展目标自愿国家审查或建设和平委员会。我们鼓励秘书处在这方面向会员国提供指导。

第二，我们必须注重建立伙伴关系。预防冲突、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需要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必须加强与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只有利用彼此的优势，多边主义才能带来应对人类最根本挑战所需的强大推力。

奥地利一直主张以新的方式理解全球一级的网络化多边主义，即联合国应与区域、次区域或专题组织进行更有力的协调与合作。为区域伙伴的行动，包括安理会授权的非洲联盟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持续的资金，发挥着关键作用。奥地利希望在今年看到这方面的进展，但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网络化多边主义和更多的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减少或偏离传统的联合国维和工作。

对奥地利来说，维持和平仍须是联合国的核心职能。与合作伙伴进行更密切的合作将要求秘书处提供更多的基本服务，无论是协调和制定标准、确保互操作性、为任务授权及其制定工作提供信息、协助建立驻地特派团、提供特派团人员以及——在区域组织离开的情况下——可能的接替部队、持续监测还是确保问责和评估。显然，更多的伙伴关系意味着新形式的联合国维和、更多样的可能性和更广泛的维和行动，但绝不是减少维和。

最后，请允许我谈一个有关维和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上月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维和会议上提到的：

需要更多的信任。信任是和平与包容性社会的核心，也是多边主义的生命线。正如概念说明（S/2023/732，附件）所指出的，不信任阻碍合作与对话。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我们如何重建信任？我们看到两个关键因素：合作与法治。

我们坚信，开展相互合作和加强伙伴关系能够在基层增加对国际体系的信任。区域组织本身也可以作为建立信任的实体，例如，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我们对它很了解，因为我们是它的东道国。欧安组织从来不是一个志同道合国家的俱乐部，而是充当一个促进建立信任措施和对话以推进集体安全的平台。

同样，法治和遵守国际法、条约和习惯法带来可预测性，从而产生信任。奥地利支持作出努力，确保探索一切途径来加强法治，特别是确保对违反最重要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准则的行为作出适当反应。确保违反准则的行为带来严重后果，甚至可能是自动产生的后果，也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预防手段。

对话、合作和严格遵守国际法将有助于建立我们所需的信任和信心，使我们能够以当初设想的方式发挥我们多边组织的功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马哈茂德先生（埃及）（*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巴西在如此紧要关头召开本次重要会议。它让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经受考验，展示安理会的公信力以及制止冲突和维护安全与和平的能力。

我们不能把解决冲突的区域机制和倡议与非洲大陆和中东的事态发展分割开来。这些事态发展构成重大危险，如果不以实现和平与正义为目的加以谨慎处理，就有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因此，我想重点谈谈非洲大陆和中东的局势，以及安理会在加强解决冲突的区域和次区域机制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在我们讨论《新和平纲领》、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以及让区域机制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时，这一点就更具有现实意义了。

首先，非洲始终清楚，必须根据非洲人解决非洲问题的原则，同时借鉴我们非洲的经验并考虑到非洲国家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发展出自己的冲突解决机制。与非洲联盟直接关联或在其主持下运作或与其机关和其他非洲次区域机制合作的非洲机制，已取得显著成功。然而，这些机制也面临重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多种方法并行且相互间协调不力。

因此，埃及赞赏安全理事会努力与这些非洲机制进行协调，包括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举行年度会议，以及安理会定期收到这些机制关于非洲问题的通报。我们重申，在处理非洲问题时，需要加强和支持这种协调，并赋予这些机制更大的作用，以确保安理会能够根据非洲的现实情况作出决定。同样，鉴于区域利益攸关方旨在防止冲突爆发和恶化的建设和平努力的重要性，安全理事会应支持非洲大陆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努力，包括资助非洲联盟和平行动以及从会员国摊款中向秘书长的建设和平基金供资。

埃及深知需要协调区域努力、倡议和机制及其在实地的执行。作为例证，我要提及7月在开罗举行的苏丹邻国首脑会议，以及在纽约和恩贾梅纳举行的旨在协调区域和国际努力以解决苏丹危机的两次部长级会议。

第二，巴勒斯坦问题仍然是中东不稳定和缺乏和平的主要原因。安全理事会无疑知道这场冲突的起因及其演变，因为安理会几十年来一直在审议这场冲突，包括加沙巴勒斯坦人民目前面临的灾难性局势。在安理会发现自己无法履职以及无法作出决定以结束目前的侵略、维护该地区和平与安全、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时候，讨论区域倡议和其他倡议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方面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

以色列继续拒绝任何缓和局势和恢复和平进程的倡议，因为它狂妄地以为自己能够延长占领并逐步彻底消除巴勒斯坦问题。尽管如此，近年来，埃及基于我们在处理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历史作用，不遗余力地防止局势接连不断的升级。埃及是第一个与以色列

达成和平协议的国家，各方都对我们实现中东和平的愿景充满信心。因此，我们将继续努力实现停火，并作出有效决定，以确保调集资源并向加沙运送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今天，秘书长在拉法口岸，与埃及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并肩工作。埃及正担负起责任，保证向我们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兄弟紧急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同样，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呼吁召开一次紧急首脑会议，会议将于明天在开罗举行，相关的区域和国际利益攸关方将与会，努力化解当前危机，达成公正、全面、可持续的解决。埃及认为，国际社会目前对巴勒斯坦问题采取的解决办法仅限于管理危机，以及通过实施权宜政策来遏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愿望。这种办法已经过时，且效率低下。

最后，我们重申，安全理事会应该能够从区域倡议和有关国家重要经验中受益。然而，这取决于安理会是否有能力发展工作机制，让这些国家在安理会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我们强调，世界目前面临的许多挑战明确证明，现在是改革安全理事会的时候了，以使其更具代表性、更加公平、更加民主，并能更好地应对国际挑战和危机。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中有一个来自阿拉伯和非洲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拥有常任理事国的所有特权，包括否决权。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南非代表发言。

乔伊尼女士（南非）（*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祝贺巴西联邦共和国担任安全理事会10月份主席。请允许我感谢通报人——哈立德·基阿里先生、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阁下、塔博·姆贝基先生阁下和何塞菲娜·埃查瓦里亚·阿尔瓦雷斯女士——向我们介绍了情况。

我们欢迎举行本次具有现实意义的公开辩论会，讨论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及双边安排对维护全球和平与安全作出的贡献。我们认为，我们的讨论不仅限于区域机制，而是包括双边安排在解决争端方面的效力和影响——一个我们很少在安理会讨论的议题——十分恰当。我还要在这份安排清单上增加联盟的作用，因为有时这种机制在支持旨在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方面是有效的，如果国际法有关规定允许，应该酌情鼓励这种机制。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三国机制在南苏丹的作用。

本次公开辩论会举行的时机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我们正在继续探讨如何处理破坏稳定事件激增的问题，这些事件包括武装冲突、违宪的政府更迭、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以及政府在治理和管理多样性方面的失败等。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冲突的根源和驱动因素本可以预防或和平解决。近年来冲突的扩散突出表明，国际社会必须优先考虑预防性外交。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谈论预防性外交很时髦才这样做。我们应该不断发问，为什么预防性外交和《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概述的措施很少得到利用。我们还必须确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善现状。

除第六章外，在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各级开展预防性外交的工具数不胜数。然而，要利用这些工具，政治意愿和富有远见的领导至关重要。另一项要求是，国际社会要有耐心，让区域安排所作的努力取得成果，尤其是在缺乏信任的时候。在冲突各方之间恢复和建立信任是一个繁琐的过程，必须谨慎处理。

鉴于我们自己成功避免一场内战的政治历史，南非相信通过对话和外交和平解决冲突。这一立场使我们能够参与双边、次区域和区域安排，有助于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布隆迪和最近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州等地的争端找到政治解决办法。我们继续参加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非洲联盟旨在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努力，这些努力以辅助性和互补性原则为基础。

区域组织因其地理位置接近，往往最适合调解其地理范围内的冲突，需要得到相应的支持。因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秘书长关于《新和平纲领》——我们作为会员国继续研究和讨论该纲领——的政策简报强调了区域组织在支持联合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方面所起的根本作用，该章为联合国与区域安排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框架。

最后，我们应该利用未来峰会和《新和平纲领》提供的机会，加强各种安排在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克罗地亚代表发言。

西蒙诺维奇先生（克罗地亚）（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保护责任之友小组发言，该小组由55个会员国和欧洲联盟组成，今年由博茨瓦纳、哥斯达黎加和克罗地亚担任共同主席。

和平解决争端是保护责任原则的核心。《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第139段一开始就断言

> “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也有责任根据《宪章》第六章和第八章，使用适当的外交、人道主义和其他和平手段，帮助保护人民免遭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之害”。

保护责任之友小组认识到双边、次区域、区域和多边努力对实现这些目标的价值，谨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具体规定了区域安排的若干独特作用，包括与使用和平手段保护民众有关的作用，如外交、预警和快速反应以及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区域组织往往能够很好地指导多边行动，应对本区域新出现的暴行局势和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为它们可能对暴行或冲突发生国的动态有更好的政治了解。

向会员国提供技术援助、建立对安全部门的信心、促进公平和负责任的治理、支持经济发展和各种区域实地行动，包括区域调解进程的体制机制，有助于预防冲突和暴行。它们不仅仅是区域组织渴望实现的目标。我们目睹了一些具体情况，显示次区域组织及其成员国为应对迫在眉睫的风险所作的协同努力，对于避免长期冲突和成功防止进一步暴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呼吁所有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帮助保护本区域民众免遭暴行，并促进预防暴行。

第二，预防暴行和有效执行保护责任议程有助于执行秘书长的《我们的共同议程》（A/75/986）和相关的《新和平纲领》。保护责任之友小组在向《新和平纲领》提交的文件中强调，预警信号，以及明确可以采取哪些早期行动，包括和平手段来响应这种警报，是有效加强预防工作的前提。有效的预警，包括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预警，应立足于准确查明增加暴力风险的所有因素，包括与暴行罪有关的因素，而不是仅仅关注冲突风险。

最后，我们要强调，秘书长在预防及和平解决争端方面也可发挥重要作用，包括通过预防性外交、实况调查和报告，以及针对冲突和暴行罪风险进行斡旋。在这方面，我们鼓励秘书长利用《宪章》第九十九条赋予他的权力，提请安理会注意他认为可能威胁到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任何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或危害人类罪的风险。我们还呼吁安全理事会成员应对和处理发生大规模暴行的风险，并在这方面注意到加强问责制、一致性和透明度国家集团的行为守则以及法国和墨西哥提出的关于在大规模暴行情况下限制使用否决权的倡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大韩民国代表发言。

赵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赞扬你召开这次及时和重要的公开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人颇有见地的通报。。

在当今世界，全球各地面临日益复杂的多方面交叉挑战。除此之外，它继续受到不断加剧的传统冲突局势和暴力的影响，正如我们在针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以及以色列和加沙当前局势中所看到的那样。

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在其《新和平纲领》中指出的那样，这些相互关联的跨国威胁远远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管理能力。因此，正如《联合国宪章》所载，我们必须设法采取有效的集体措施，防止和消除对和平的威胁。

区域和次区域机制别具优势——不仅因其非常熟悉所在区域从而有利于理解冲突的根源，而且还能够在各自区域促进有关各方之间的信心、信任和对话。

这些工具为《宪章》第六章规定的和平解决争端奠定了基础。

正因如此，安全理事会应充分利用其邻近的相对优势和促进建立信任和对话的现有机制，根据区域自主的原则，不断努力预防及和平解决冲突。在这方面，大韩民国欢迎10月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安全理事会与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十七次年度联合协商会议的成果。我们认为，安理会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继续作出这种努力，同时铭记以下三点。

第一，安全理事会应加强与区域机制和组织的合作。除了要求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的伙伴关系外，我们还应当关注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其他区域和组织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次区域机制，其预防与和平解决的工具也已得到发展。建设和平委员会也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桥梁作用。

第二，充足的资源和资金是建立强有力的区域框架和组织的关键。因此，韩国支持为非洲联盟领导的和平支助行动提供可预测、可持续和灵活的资金，包括在必要时获得联合国摊款。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找到确保问责制、透明度和有效使用这些资金的方法。作为即将上任的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期待即将就这一问题进行的谈判。

第三，应在进程的各个层面确保包容性。包括妇女和青年在内的民间社会行为体在建立社会信任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区域机制的伙伴关系必须始终以人为本，以便来自我们社会每个角落的各种独特声音能够丰富通往可持续和平与发展的道路。

近年来，大韩民国通过与各种区域机制定期磋商，积极扩大其参与范围。今年5月，我们首次主办了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峰会。我们还与非洲伙伴合作，为明年成功举行韩非首脑会议开展筹备工作。韩国希望通过这种参与，帮助区域机制以及国际社会为所有人建设可持续和平的努力作出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德沃尔尼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乌克兰高度赞赏主席国巴西倡议举行今天的重要辩论会，并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通报。

乌克兰一贯坚定支持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这是有效解决冲突和促进全球和平与安全、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和人权的重要工具。因此，我们支持这样一个事实，即《新和平纲领》特别注重强有力的区域框架和组织，将其作为必要的网络化多边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长期安全架构正在崩溃的区域。

毫无疑问，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在各自区域努力实现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区域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有许多例子表明，联合国与欧洲联盟、非洲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等建立了这种宝贵和注重成果的伙伴关系。

就我国而言，从俄罗斯2014年开始侵略到去年2月的入侵，欧安组织在实地一直相当活跃。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组织，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集安组织），这是事实上由俄罗斯领导的军事集团，它已成为俄罗斯在该地区使用破坏性政策工具的明显例子。我们的共同任务是维护联合国的公信力，抵制打着第八章的幌子将集安组织等组织纳入联合国平台的企图。

我们支持主席国巴西提出的通过处理双边安排在和平解决冲突中的作用来扩大讨论范围的想法。本地区目前的安全事态发展，特别是俄罗斯正在对我国进行的战争，突显了为支持侵略受害者抵御侵略而建立的特设框架和网络的重要作用和贡献。

与此同时，这些事态发展再次提请我们注意侵略者占据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问题，这至少可以说在法律上是存疑的。这种存在影响了安理会作出真正反应，在欧安组织框架内的区域一级也出现类似情况，因为欧安组织的决策是以协商一致为基础的。

主席已将集体安全机制改革问题确定为今天公开辩论会的引导性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处理我刚才提到的关于侵略者非法窃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

位的问题以及俄罗斯不愿意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四条作为爱好和平的国家行事的问题应当是答案的一部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丹麦代表发言。

劳森先生（丹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在这个战争和冲突不断发生的困难时刻召开今天关于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的会议。我也感谢各位通报人。

我荣幸地代表芬兰、冰岛、挪威、瑞典和我自己的国家丹麦这五个北欧国家发言。

显然，只有冲突各方才能实现可持续和平。第三方，无论是国际行为体、邻国还是区域组织，都可以为各方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提供支持。在今天的公开辩论会中，北欧国家想提出四点意见。

首先，对话是解决冲突的关键工具，但也是预防冲突的工具，我们鼓励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更好地发挥自身潜在的预防作用。我们还建议利用建设和平委员会的潜力，促进包容性地预防和解决冲突。

联合国在支持各方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秘书长的《新和平纲领》让会员国有机会加强其在处理当前安全挑战和不断变化的威胁方面的作用。这是在人道主义-发展-和平联系中进一步发展预防性非暴力解决冲突机制和联合国外交工具箱的机会。

我的第二点涉及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作用，它们可以凭借其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潜在的人际关系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宪章》第八章明确规定了区域组织的这一作用。我们鼓励更频繁地利用这一章，包括通过深化安全理事会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这样做。任何进程中地方自主权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由此我要说到第三点。正如《新和平纲领》明确指出的那样，自主权对于任何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的进程都至关重要。各方必须提出并自主掌握解决办法，这种自主权必须是包容性的。

接下去我要谈到第四点，这一点与包容性有关。和平进程应始终反映受冲突影响的利益攸关方的需求和观点。加强妇女、青年和整个民间社会的全面、平等和切实参与至关重要。事实上，增加谈判桌前的席位是有回报的。如果一个进程没有包容性，就很难实现可持续和平。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今天的辩论会，讨论这个在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的议题。我们北欧国家要强调，我们与联合国和致力于打造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未来的会员国站在一起。

最后，我要引用本周去世的芬兰已故总统阿赫蒂萨里的话。

> “我们如果共同努力，就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不应接受当权者的任何借口。和平是一个意愿问题”。（诺贝尔演讲，2008年12月10日）

主席（*以英语发言*）：本次会议发言名单上还有一些发言者。鉴于时间已晚，征得安理会成员同意，我打算暂停会议，今天下午3时复会。

下午1时会议暂停。